

● 王殿卿 潘龙海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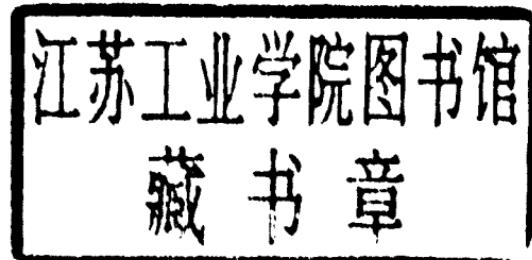
中华主旋律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论

●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华主旋律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论



向母校 50 周年大庆献礼

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

六二届毕业生王殿卿

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 刘幼成 李 红

封面设计: 罗 光

中华主旋律

——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论

主编: 王殿卿 潘龙海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mm 1/32 印张: 10.375

1994年11月第1版 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7216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16—2956—7/G · 554

定价: 6.80 元

序　　言

周之良

“平生铁石心，忘家思报国”(陆游)。

祖国，它是所有母亲的母亲，所有父亲的父亲，所有祖先的大摇篮。

热爱祖国，是一个国家民族意识和觉悟的集中体现。爱国主义思想的生成，是人类发展进步、不断社会化的标志，也是人的主人翁意识增强的表现。千古英雄，同怀爱国赤子之心。它是深厚感情，它是道德责任，它是政治信念，当然也是思想教育的永恒主题。

爱国主义觉悟同一切优良的思想品德一样，都不可能是自发形成的，而只能是长期教育熏陶的结果，在这个教育过程中，也必然包括着对卖国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想的斗争。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呢？我想至少以下三点是值得注意的。

(一)从史入手。爱国主义思想形成的基础，是对祖国全面、正确的认识。知之愈深，则爱之愈切。现在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继续。学史才能鉴往知来，才能对祖国有系统的规律性的认识。所以，早就有人

称史学乃是“爱国心之源泉”，章太炎甚至说过：“不知史则无从爱国。”这些都是前人饱经磨难而得出的经验之谈，我等切不可不予以重视。前些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也甚嚣尘上。不断有人鼓吹反对一切传统，对祖国的历史尽皆否定，把民族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致使一部分人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淡漠，甚至于崇洋媚外，误入“全盘西化”的梦幻之中。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加强对近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这是立国长久之计。由此看来，如何对待历史传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大事。我们应记取历史经验，通过多种渠道正确地进行历史教育，使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更深固的根基。

(二)学习先进人物。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是向爱国者学习。因为，先进的爱国者、英雄模范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爱国主义的形象教材。屈原、岳飞、刘胡兰、董存瑞……曾经唤起了多少同胞挺身卫国，这恐怕是任何人也难以统计的。这些爱国者所体现的高尚情操和人生价值观，将永放光芒，激励后人。如果说，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责任感，而这又恰是当前教育工作的难点，那么，学习爱国者的先进事迹与思想，则是化解这一难点的良方。我国各民族都有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从古至今，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是写不尽、讲不完的。这是中华民族的无价之宝。如果对此不知充分利用，或是忘却了，那不仅会

使思想教育苍白无力，而且如同是犯罪。郁达夫曾经讲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有了英雄却不知怀念、视若飞灰的民族，将永远是堕落之邦。

(三)以正确的理论观点为统率。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但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潮相联系的。各个阶级也都力图在爱国主义思想中注入本阶级的意识，借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我们对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必须进行正确的历史分析，现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则必须与社会主义教育紧密结合，以社会主义思想为统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江泽民同志说：“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历史证明，坚定捍卫中华民族尊严、期望中国繁荣昌盛的爱国者，大都会成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的可靠朋友。”

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社会形态。按恩格斯的说法，应“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服务。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当代的爱国者，既不是崇洋媚外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是故步自封的国粹派。时代要求我们，要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要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做斗争，但不盲目排外；要弘扬民族

的一切优良传统，但决不抱残守缺、袒护落后。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重要方针，同样适用于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也只有遵循这样的方针，爱国主义教育才会具有蓬勃的生气和时代感。

写了以上三点浅薄之见，远未能回答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论》在这方面做了很有益的探索。书的内容全面，史论结合，资料丰富，胜我多矣。我很荣幸能为本书作序。唯愿能与本书的作者、读者一道，共同努力，更深入地开展对爱国主义思想的研究，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兴旺发达，奉献薄力。

1993年春节于北京师大

中国应有新的思想文化战略

(代序)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有了经济发展战略之后，还必须有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思想文化战略。当人们对前一个战略的认同日益强化，而对后一个战略甚是模糊之时，在现实生活中，就难有物质与精神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一个畸形发展的社会，将对整个民族的美好未来，构成潜在的威胁。中国是一个经济与文明都需要发展和建设的国家。21世纪的中国，不仅要振兴经济，而且要振兴文化，使东方文化与文明在全世界再度辉煌。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讲过，“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

进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些讲话，为我国建立新的思想文化战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强调承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培养和强化新一代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一个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根基，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整合与创造出反映历史进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造就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文化战略，逐渐孕育成型。1994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文化。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要认真研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自己。我们讲继承、讲借鉴，目的是通过继承和借鉴，使民族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精华，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不断更新，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一全面的阐述，可以视为我国面向21世纪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战略。有了这一战略，将使社会主义更具中国特色。

一个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思想文化建设战略，是中国面向 21 世纪的需要，也是 100 多年来，中国人前赴后继所思考和探求的结晶。

中国从鸦片战争起，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广泛深入地展开了思想文化的入侵。19 世纪的后 50 年，他们在中国不少地方，从大中城市到穷乡僻壤，建立起成千上万座教堂，至今犹存，这是西方思想文化入侵的实证。面对“西学”对“中学”的冲击，中国近代史上不少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们苦苦求索，力图设计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略。

100 年前，也就是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康有为先后问世了《孔子改制考》(1887 年)和《新学伪经考》(1891 年)，这两部书成为变法维新的理论参照。1898 年 6 月，光绪皇帝下诏变法：“……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表明了中西两学相结合的态度。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更加明确地提出：“合经子之奥言，操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表明了他想把古今中外之思想文化精华加以整合，进行精神产品再生产的苦心。他在实践中，一面认为“孔子之道，博大普遍，兼该人神，包罗治教”，一面建议晚清王朝办学校要“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1898 年 7 月，梁启超按照光绪皇帝旨意，参照日本和西方学制，起草了《京

师大学堂章程》，规定其办学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同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主张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本，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他认为，办学校要“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此举为造就人才之枢纽，维持人心之本原。”

如果说 19 世纪最后 10 年，所形成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旧并存，中西杂糅的思想文化战略的“新思路”，在百日维新失败之后，未能付诸现实，那么到 20 世纪前一二十年间，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后，则一度成为孙中山治国安邦的一种指导思想。他认为，近代中国虽然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但在世界各国之中，“文化上是先进的国家”，“外国材料，向来无可完全仿效”。中华文化之出路，既不能固守原有文化，也不能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应当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结合起来，使自己“驾乎欧美之上”。在这一基本思想下，他“兴实业”，“倡教育”，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造就人才。他主张学西方“语言文字”、“政治礼俗”、“天算地舆”、“格物仕学”、“时局变迁之故，睦邻交谊之道”等“富国强兵之道，仕民成俗之规”。他主张在批判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给传统道德注入新的内涵从而建立新道德。他认为，“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在民国之内讲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忠于

民，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比较为一个人效忠，自然高尚得多”。他还认为，“仁爱”即“博爱”。“杀身成仁”，若因革命而死，因改造世纪而死，则“重于泰山”、“无量之价”和“无尚光荣”。

蔡元培作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依据孙中山的思想，提出了新的教育方针，在北京大学任校长期间，又提出了“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1917年3月他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讲中指出：“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他要求新一代知识分子要保持中国人的人格。这种教育思想，曾为造就一代左右了20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伟人，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蔡元培在吸收消化西学方面贡献卓著，但在反对尊孔读经之中，没有肯定和保住儒家思想中的精华。这就为“五四”以后“打倒孔家店”用“西学”取代“中学”，全盘西化的历史与民族虚无主义长期泛滥埋下了隐患。

从“五四”运动到“批林批孔”的50年历史进程中，“儒学”与“儒家”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的命运每况愈下，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也几度得逞。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研究，对待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厚今薄古”，这都是明智而正确的。但是，这一方

针并未得到认真和全面的贯彻。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他们这一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把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沃土之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供应了丰富的文化营养。毛泽东的“老三篇”等著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述，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代表作。新中国成立后，在对新一代国民进行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他们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道德教育，不能说不是一种失误。这一失误致使 50 岁以下的两三代人，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美德，已深感陌生，使当今整个社会承受着文明与道德水准与日俱下的惩罚。

20 世纪 80 年代，在青年知识界曾经一度掀起“东西文化比较热”，这股风是以否定和牺牲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前提，以全盘肯定和宣扬西方文明为宗旨。当《河殇》高唱用“蓝色文明”取代“黄色文明”受到批判之时，才给这场全盘西化崇洋媚外风暂时划了句号。它提醒人们反思 100 年前，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挣扎的一代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们探索“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文化战略的历史得失，从而面对当今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东西方文化新一轮碰撞，以及 21 世纪中国之命运，不得不思考和探求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文化战略。

如果说，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三四十年，是西方文明在中国自由泛滥，冲击东方文明的时代，那么，能否预见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这三四十年，将是东方文明再度复兴，并向西方文明提出挑战的年代。

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已经证明：固守旧有传统，不学习、借鉴、消化外来的先进文化与文明成果，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化传统，也难以承传，对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也难有补益；同样，任何外来的思想，如果不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思想，也难免不走向僵化与教条，被国人所疏远，被新一代国民所拒受。

王殿卿

1994 年 4 月于京郊
花家地南里 12431 书屋

开 篇

摆在您面前这部《中华主旋律——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论》，是一部非史非论，以史为本，以论带史，全新体系的著述。它以一种探索的态度，为您提供一条 5000 年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形成、发展和变化的线索。

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一词，古已有之。中是中原，华指华夏。“民”和“族”这两个概念，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均有阐述，并各有其确定的内涵，将它们合成“民族”一词使用，则始于近代。1899 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用了“民族”这一概念，据说是从日本引进的。进入 20 世纪以来，由于中国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以及世界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民族”一词在中国才逐渐通用。1921 年 3 月，孙中山提出，把中国境内一切民族融合“建设一大中华民族”，^① 从而使“中华民族”一词习延至今。

中华民族的确切含义，不同于人类学或民族学所指的狭义的（血缘的或体质的）民族或种族，也不是简单地以国家的

^① 《孙中山集外集》第 187 页。

概念作为民族的概念，而是作为以汉族为主体的 56 个民族的总称，是一个历经数千年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多民族的群体。本世纪以来，这一概念已为中华各族人民所通用，并且也在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华儿女中形成了共识。作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指中华各民族的整体。散居海外的华侨与华裔，也不仅是汉族的后裔，而是包括满、蒙、回等各民族的子孙。所谓“华”，已不是古老意义的作为汉族祖先的华族，而是中华民族的简称。许多海外华人，虽然国籍已经改变，但他们仍然以自己是中华民族的后代而自豪，世世代代念念不忘自己的民族和祖国。这也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把海外炎黄子孙的爱国壮举，载入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册的缘由。

“爱国”二字在我国历史文献中早有记载。《战国策》的《西周》一章中，讲到秦国想吞并西周时，就有“周君岂能无爱国哉”的说法。到东汉献帝时，荀悦所作的《汉纪》中，也提到“亲民如子，爱国如家”。可见，爱国的观念早在 3000 年前，就在中华大地上流行通用了。当然，中国古代的“国”与现代意义的“国”是有差别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国”，是指特定的共同生活区域，即现代意义的家园。“国”的繁体字“國”，是由甲骨文“或”演变而来的。古时“或”称“国”，到了西周，“或”字外面加上了“口”，成了“國”。“國从口从或”，而“口”即围绕周围之义，有了边界的生活区域。在古代，“国”与“邦”意义互通，均为天子所封，都有一定地域界限。

爱国主义思想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形成的，是千百年来积淀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一种最为深厚的情感。

爱国主义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项道德准则。它体现着个人和国家的道德关系，即个人对养育、培育和保护自己的祖国的深厚感情，个人对祖国应有的义务。具体讲，爱的对象包括个人对祖国的土地、山河、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和自己患难与共的、生活在同一国土上的统一民族的崇敬和爱护。热爱祖国，是国家对每一个公民提出的起码的政治要求和道德义务。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与主权，积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的各项建设事业，维护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和安定团结，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等等。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每个时代的爱国主义，总是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与使命紧紧结合在一起，因而爱国主义既有共同性，又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中国古代的爱国，一般是爱天子所封的“邦”或“国”；在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是并提的，自秦至清的各朝各代，“爱国”都是爱封建家族所统治的封建帝国。近现代的爱国主义，是反帝反封的爱国主义，是同反抗外国侵略、救亡图存、建设新中国结合在一起的。当代爱国主义，则是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书在具体阐述过程中，尽量以这种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对不同历史时代的爱国主义进行把握，但是，又难以对每个历史事件，每一条史料，都进行时代的、阶级的、重复性的评价。这是开篇之处需要向读者申明的。

爱国主义是整个民族精神之中重要组成部分，是长存于民族意识中强有力的民族精神，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威力，它对 56 个